

文化场域对钟理和创作的影响 / 原乡的失落 / 悲悯情怀的书写 / 文化的反思 / 『不屈的作家魂』

文化视阈下钟理和 创作研究

蓝天——著



人民
文学
出版社

文化视阈下 创作研究

蓝天——著



人民
出版
社

责任编辑：曹 春

封面设计：汪 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视阈下钟理和创作研究 / 蓝天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8

ISBN 978-7-01-020520-5

I. ①文… II. ①蓝… III. ①钟理和（1915—1960）—文学创作研究

IV. ①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48604 号

文化视阈下钟理和创作研究

WENHUA SHIYU XIA ZHONGLIHE CHUANGZUO YANJIU

蓝天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2019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22.75

— 字数：293 千字

ISBN 978-7-01-020520-5 定价：9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受导师王富仁的影响，对中国现代时期的乡土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读书期间，在老师的指导下，阅读了大量相关文献，为自己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由于当时条件有限，接触到的台湾地区乡土文学的文献很少，这成为学习中的一个遗憾。毕业之后，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始终没有偏离乡土文学这个领域，一做就是 20 多年。

15 年前，我调入广东工作。有一段时间，因为工作需要，经常到梅州地区的几个市县出差。某次来到广东最北端的蕉岭县，在当地同志的陪同下，参观了我国近代著名爱国诗人丘逢甲的故居。丘逢甲是台湾苗栗人，进士出身，甲午战争爆发后，他在家乡组织义军抗击日军。失败后，离台内渡，回到祖籍推广新式教育直至去世。他在著名的《春愁》一诗中写道：“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该诗写于清政府割让台湾后的第二年。他身处较为平静的粤北山区，但是，站在山巅，秀美的山区春色并未激发诗人的兴致，相反，当他远眺海峡对岸的故乡台湾时，想到自己的家园被侵略者占领，无边的春愁涌上心头。让我吃惊的是，当地同志告诉我，蕉岭本地人口不过 20 多万，但在台南地区蕉岭籍的台胞却有 40 多万，他们大

多是一二百年前渡海到台湾谋生的蕉岭人的后代，尽管几百年过去了，但这些蕉岭人的子孙从来都没忘记在大陆的祖籍，直至今日还不断返乡寻根问祖。陪同的同志说，这就是流淌在每一个客家人血液里的“原乡情结”。

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粤北地区的客家文化，通过查阅大量的文献，惊喜地发现，不少台湾地区乡土文学的许多代表性作家的祖籍都是嘉应府（现梅州）的，如赖和、吴浊流、钟理和、杨逵、龙瑛宗、张文环、巫永福等，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此时，两岸交流日益频繁，台湾地区的不少文献也被国内的高校、研究机构、图书馆引进，有了这些便利，我逐渐将研究方向转移到台湾现代乡土文学上。“知人论世”，这是王富仁老师传授给我的文学研究方法，他说做文学研究要先系统地掌握被研究对象的背景材料，之后再深入到具体的对象中。受老师的影响，我在研究相关作家时，一般按照日记、信函、回忆录、史料等顺序依次收集材料和研读。

在我接触到的台湾文学文献中，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的1997年版的《钟理和全集》最为系统和完整，全集共六册，其中，日记和信函各占一册。这是馆里的一位朋友在整理一堆下架的图书中发现的。该馆只购进了一套，从上架到下架一直无人借阅。朋友知道我在查找台湾文学方面的资料，第一时间通知了我。我如获至宝，复印了完整的一套。此后，从阅读钟理和的日记和信函为起点，开始了对这位被称为“台湾乡土文学之父”的研究。与同时期的台湾省籍作家相比，钟理和的人生经历更丰富也更曲折，他的日记和信函是他文学活动中重要的一环，他将自己的所见、所感，自己内心的痛苦与病体的折磨都毫无保留地记录了下来，这些内容又与他的创作相互印证，形成一种独特的文艺风格。钟理和的长子钟铁民说：“钟理和的文学非常贴近他的真实的人生行程。”如果不读钟理和的日记和信函，你很难想象一个在大陆和台湾

流浪半生，人生的最后时光拖着残病之躯蜗居在台南偏僻的山村的人，却与山外的同道之人合力创办了一份《文友通讯》，这份同仁刊物奠定了台湾当代乡土文学的基础。在他的日记与信函中，流露出更多的是对他人的关爱与同情。正如施懿琳所说：“贫与病的交织，是他后半生的所有内容。苦过、痛过，因此，他更懂得以体贴细腻的心，去倾听大地苦难生灵的呻吟。并透过他的笔，写出了这些孤独废疾者贫病交迫的无奈和凄伤。”

2009年，一位在台北做外派记者的大学同学又给我带回一套最新版本的《钟理和全集》，共8卷本，增加了钟理和的未完稿和他搜集整理的台湾民间文学作品等。有了这些资料做基础，我的研究工作也进一步深入，先后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即以“钟理和的创作研究”为题，得到了答辩组各位专家的好评。即便如此，我仍然觉得自己对钟理和的认识与理解还很肤浅，还没有能真正触及到他的灵魂深处。

这些年，我反反复复研读《钟理和全集》三四遍，每一遍都有新的感受和体悟，同时也萌发了撰写专著的念头。在正式动笔之前，我特意去了一趟位于梅州市梅县区白渡镇嵩溪村的钟理和祖居地，让我没想到的是，钟家迁台已经一两百年，其祖屋虽坍塌了一半，家族的祠堂——孝友堂还保留完好。听村里的老人说，台湾的钟氏家族与大陆的亲友始终没有断过联系，一代一代延续下来，钟理和的父亲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两次回到嵩溪村祭祖和探望长辈，还将几个钟氏子弟带到台湾谋生。梅州之行让我找到了解读钟理和创作的密码，那就是血浓于水的民族情感。无论是在殖民时代还是在两岸分离的时代，钟理和始终秉承祖辈传承下来的文化基因，在创作中彰显“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人文精神的特色”。

我的理论基础较薄弱，在写作中常常纠缠于某一个具体的问题而不

得解。感谢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郑春的指导与帮助，尽管书稿很粗糙，但他仍给予了肯定，并帮助我一起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优秀作家的作品总是经得起时代的风雨和考验，钟理和及他的作品是最好的诠释。他生前无人问津，病逝后在林海音、钟肇政、张良泽等人的帮助下，钟理和的作品才陆续面世，在两岸及华人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终成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对钟理和的研究也只是刚刚开了个头，我会一直坚持下去，让更多的人熟悉他、了解他、热爱他，把他身上对民族、对苍生、对土地矢志不移的爱传递下去。

最后，我引用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说的一段话向钟理和先生致敬：“人的不朽，不只因为他在万物中是唯一具有永不耗竭的声音，而是因为他有灵魂，那使人类能同情、能牺牲、能忍耐的灵魂。诗人和作家的责任，便是要写出这种同情、牺牲与忍耐的人的灵魂。诗人和作家的天职，是借著提升人的心灵，鼓舞人的勇气、荣誉、希望、尊严、同情、怜悯和牺牲，这些人类一度拥有的荣光，来帮助人类永垂不朽。”

蓝 天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日于越秀山下

目 录

序.....	001
绪 论	001
第一节 “倒在血泊里的笔耕者”	003
第二节 钟理和研究综述	011
第一章 文化场域对钟理和创作的影响	021
第一节 台湾文化场域的形成	023
第二节 族群文化对钟理和创作的影响	035
第三节 原乡与故乡	056
第四节 文化场域的迁移：放逐与返乡	073
第二章 原乡的失落	099
第一节 认知暴力下的身份困惑	101
第二节 身份的迷失	120
第三节 “矛盾时代中矛盾的人”	138
第四节 历史的书写与反书写	155

第三章 悲悯情怀的书写	172
第一节 台湾早期垦殖生活的悲苦	173
第二节 “同姓之婚”下的悲剧人生	179
第三节 挥之不去的死亡意识	193
第四节 弱势群体的守望者	210
第四章 文化的反思	233
第一节 “文学的方言”	236
第二节 乡土的沉思	253
第三节 “国民性”批判的继承与发展	286
第五章 “不屈的作家魂”	306
第一节 文学思想的升华	307
第二节 超越个体的人文情怀	326
第三节 台湾新时期文学的开拓者	340
结 语	345
参考文献	348
后 记	354

绪 论

1980年，以台湾现代著名作家钟理和生平为素材的电影《原乡人》在岛内引起轰动，主题歌中唱道：“我张开一双翅膀 / 背驮着一个希望 / 飞过那陌生的城池 / 去到我向往的地方”，简短的几句歌词，触发了许许多多台湾人心中埋藏的“原乡情”。

早在1965年，台湾本土文人叶石涛在《文星》发表《台湾的乡土文学》一文，重新提出从理论上解释“乡土文学”概念的问题，该文开启了台湾文坛长达十多年的“乡土文学”论争。《原乡人》的热映既让观众对钟理和“台湾—大陆—台湾”传奇的人生经历产生浓厚的兴趣，即便是本土色彩浓厚的叶石涛在评价电影《原乡人》时也不得不说：“《原乡人》这部片子，把一个心向往于祖国，一生只愿以中文写作的台湾知识分子赤裸裸的心路历程有力地勾画出来，正确地指出台湾省人民共同的愿望。”^①电影的上映也引发了岛内关于“原乡”与“大陆”、“乡土”与“本土”等敏感问题的热议。有人说：“谈表现台湾乡土，他是数一数二、甚至也许是唯一唯二。”^②的确，台湾的“乡土文学”无论如何也

① 叶石涛：《文学回忆录》，远景出版社1984年版，第75页。

② 方以直：《悼钟理和》，载《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台湾文学馆2011年版，第95页。

绕不开钟理和。在电影效应的带动下,“乡土文学”的批评焦点迅速转移到他的身上,各路人马围绕钟氏的作品及创作思想展开新一轮热热闹闹的文学争鸣。然而,这一切对于身前默默无闻、已经去世 20 多年的钟理和来说都不重要了,如若在天有灵,他既会为自己几十年呕心沥血的努力终获公认感到欣慰,也会为时下部分台湾学人将他和他的作品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感到无奈和担忧。

今天,两岸的文化交流虽然日益频繁,但是,由于各种内外因素的冲击,一些文化议题上的杂音不断。在政治的操纵下,台湾地区中华文化的根本属性受到挑战,并且有升级的危险。当我们再次将目光投向以“原乡人”自称的台湾本土作家钟理和,将他的思想和创作置于中国历史文化大的背景之下,可以发现这位生长于殖民时代,受过奴化教育的台湾知识分子身上有着坚韧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信念,他在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勇敢地与妻子奔逃到向往已久的原乡大陆,“这种反抗以及因反抗而遭受到的种种苦难,并未使他变得偏激、严酷、或冷嘲”^①,这一点恰恰体现了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人文精神的特色。尽管原乡之旅充满了艰辛、困惑、失落,钟理和却从这些磨难中成熟起来,他认识到外族侵略带来的是全民族的劫难,而非某个区域,此前受殖民奴化教育造成对祖国的“见解之错”以及自信力的丧失,也在身份的认同过程中得到纠正和构建。台湾光复后,他返回故乡,此后,他始终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进行写作,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民族文化熏陶成就的民族情感历久弥坚,他从内心深处发出“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的呼唤。钟理和的成长经历和思想历程是台湾近现代历史和文化发展的缩影,他所达到的境界,是同时期台湾作

^① 林毓生:《钟理和“原乡人”与中国人文精神》,《联合报》1980年8月2日。

家“无法比肩”^①。钟理和终其一生在追逐自己的理想，用炙热的感情拥抱自己的民族和同胞，他表现出了传统人文情怀、忧患意识和源于民族情怀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正因为如此，他获得两岸同胞共同的敬仰和尊重。

钟理和一生经历了日本殖民台湾、中国抗战、台湾光复、两岸分离等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他是民族苦难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用“精确而优美的写实技巧”^②记录了民族文化的衰落、挣扎、涅槃和新生。他的成就来自对民族文化的虔诚和坚守，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文化信仰，更是台湾地区文化复兴的必由之路。

第一节 “倒在血泊里的笔耕者”

钟理和 1915 年 12 月 15 日生于台湾省屏东县高树乡广兴村，卒于 1960 年，享年 45 岁。钟家祖辈来自广东梅县白渡区江南村，渡台后在屏东地区繁衍生息，到钟理和已是第六代。根据他的自传体小说《原乡人》记载，钟理和的父亲曾经“不辞跋涉之苦深入嘉应州原籍祭扫祖先”，回来时还带来了一位远房堂侄。从这些细节来看，钟家几代人一直保持着与祖籍地的联系，虽远隔千山万水，却割不断两岸血浓于水的亲情。在家庭的熏陶和父辈的言传身教下，“原乡情结”在钟理和幼小的心灵里已经扎下了根。钟理和六岁时就被父亲送到当地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开始接触中国传统文化。课后，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钟父还要给他讲解一些诗文。生在殖民时代的钟理和是不幸的，好在殖民早期，日本

① 方以直：《悼钟理和》，载《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钟理和卷》，台湾文学馆 2011 年版，第 65 页。

② 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文学界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98 页。

人出于笼络人心的目的，并没有完全禁止乡间私塾，使他在成为“亡国奴”后还有机会接受较系统的中文教育，这为他今后从事中文写作打下了坚实基础。此后八年他也被迫进入日本办的“公学校”学习，但钟父始终没有让他放弃中文学习。在暑假期间，钟理和和自己的兄弟及表兄弟都被送回高树乡的私塾继续学习汉语。从公学校高等科毕业后，钟理和名落孙山，未能升入更高级的学校，钟理和受到的“刺激相当大”^①，“深深地刺伤”^②他的心，觉得“每一个都比自己中用”^③，产生深深的自卑感。这个阴影一直伴随着他，对他的性格形成影响至深，他对弱者的同情和体贴也正是源于这种感同身受的心理。钟理和回乡之后，遵照父命，师从当地秀才光达兴继续学习汉语一年半，与他同时期的台湾年轻人恐怕很少有这样的学习经历。在私塾学习期间，钟理和广泛猎取了“中文古体小说”，随着中文阅读水平不断提高，他又开始“废寝忘食”地阅读大陆新文化运动中著名作家的新体小说，“在热爱之余，偶尔也拿起笔来乱画”“籍此满足模仿的本能”^④。据他自己说这个时期曾写过一篇《由一个叫花子得到的启示》的短文，后来看了《红楼梦》，又学习写长篇，题目取自当地流行歌曲名《雨夜花》^⑤。虽然钟理和还没有“打算当作家”，但对文学已经发生了浓厚兴趣。一年半后，钟理和随同父亲迁居美浓，一同“开拓山林”，他的生活在这里发生了巨大变化。

钟父钟蕃著名闻六堆客家地区，是地主也是乡村企业家，在日本殖民时期叱咤风云，亦农亦商，经营过制材所、砖瓦窑、车行、布庄，开

① 钟怡彦编：《新版钟理和全集·7》，高雄县政府文化局2009年版，第135页。

② 钟怡彦编：《新版钟理和全集·7》，高雄县政府文化局2009年版，第115页。

③ 钟怡彦编：《新版钟理和全集·7》，高雄县政府文化局2009年版，第136页。

④ 钟怡彦编：《新版钟理和全集·7》，高雄县政府文化局2009年版，第136页。

⑤ 钟理和：《钟理和自我介绍》，载《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钟理和卷》，台湾文学馆2011年版，第83页。

办农场，并做外销生意，与人合资在日本、中国大陆等地设有商行，晚年在美浓购买笠山农场，准备退休养老。良好的家境和修养培养出钟理和幽雅的气质，他深得父亲的喜爱，同时也对他寄予厚望。在笠山农场，他一方面协助父兄的事业，另一方面仍在读书写作。对钟理和最终从事文艺工作影响巨大的二哥，此时正在日本读书，他曾不断给钟理和寄送日译本世界文学和有关文艺理论的著述。

在与农场里的工人接触中，钟理和认识并爱上邻村来做工的女子钟台妹。不过，因为两人同姓，他们的恋爱触犯客家人礼俗大忌，在重视传统和宗族观念的客家族群社会里，同姓之婚被视为乱伦和大逆不道，两人恋情一公开就遭到家庭和社会的强烈反对。但是，这些压力非但没有让钟理和妥协，反而激起了他“类似偏执狂的固执和倔强的意志”。钟理和“不惜和父亲、和家庭、和台湾诀绝”。^①义无反顾与妻子踏上自我放逐之路，开始了他们的原乡之旅。钟理和在回忆自己的文学道路时，特别提到这件事情对他的影响：

封建势力有压倒之势，不容抗拒，在它下面，我是软弱渺小，孤独无援。如何才能让自己在这场搏斗里支持下去呢！很显然的，我必须借助更好有效的武器，否则败北是注定了的。于是，我又想到我兄弟那句话。也许我可以用我的笔！这思想把我更深的驱向文艺。由这时候起，要做作家的愿望和意志渐渐在心里头坚定起来。^②

在钟理和身上，鲜明体现着客家人千百年来锤炼出来的“硬颈精

① 钟怡彦编：《新版钟理和全集·7》，高雄县政府文化局2009年版，第137页。

② 钟怡彦编：《新版钟理和全集·7》，高雄县政府文化局2009年版，第137页。

神”——不向困难低头，不向命运低头。强大的封建势力没有压倒钟理和，他与妻子挣脱了世俗的束缚，逃到陌生的大陆，争得了做人的自由。他们先后流落在东北、华北等地区，生活也曾一度“濒临绝境”^①，但钟理和始终坚持“做一个文化工作者的决心”，专心读写。据他自己说，从1943年起“开始有作品发表”，到了1945年，他在北平出版了包括两部中篇和两部短篇的作品集《夹竹桃》。尽管钟理和自称这部作品集是“不成熟的劣作”，但它的风格与思想内涵却是独特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几篇以台湾人的视角描写大陆现实的作品，它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显现出来，成为时代的经典。

日本投降，举国同庆，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同样欢欣鼓舞。然而，50年的殖民在大陆和台湾之间制造出了情感裂痕，它像一条巨大的沟壑横亘在两岸同胞的内心世界。因“台湾人过去曾为日本籍民”，从政府官员到一般百姓，不少人私底下视他们为“汉奸”。在北平这种过去的“敌占区”，台湾同胞不被优遇，各处受到歧视、欺负。面对政府荒唐的做法，身在北平的钟理和愤怒地说：“国家对人民拿起报复手段，已是天下古今咄咄怪事，而我们则实实在在的不知道国家要对我们报什么仇。难道台湾人五十一年奴才之苦，还不够吗？难道台湾人都个个犯着弥天大罪，应该‘诛及九族’的吗？”^②本来抱定“誓死不回的决心”的钟理和夫妇与其他同乡一样，在当时的气氛下，“不能不离开住惯了的祖国，逃回台湾”。^③临别之时，钟理和在《白薯的悲哀》一文中痛苦地写道：

北平是很大的。以它的谦让与伟大，它是可以拥抱下一切。但

① 钟怡彦编：《新版钟理和全集·7》，高雄县政府文化局2009年版，第137页。

② 钟怡彦编：《新版钟理和全集·5》，高雄县政府文化局2009年版，第271页。

③ 钟怡彦编：《新版钟理和全集·5》，高雄县政府文化局2009年版，第276页。

假若你被人晓得了是台湾人，那是很不妙的。那很不幸的，是等于叫人宣判了死刑。那时候，你就要切实的感觉到北平是那么窄，窄到不能隐藏你了。因为，它——只容许光荣的人们。因为，你——是台湾人。然而悲哀是无用的。而悲愤，怨恨，于你尤其不配。^①

带着伤心和苦闷，钟理和夫妇结束了大陆八年漂泊生活，随着逃难的人群返回阔别已久的故乡——台湾。从此，他再也没有踏上大陆的土地，只能在记忆中回味原乡的时光。战后的台湾萧条败落，归来后的钟理和又将面临着更大的人生挑战。大陆八年，生活艰辛，特别到了后期，常常要靠在北平的一位表兄接济。据他的长子钟铁民回忆，钟理和熟稔日语，但在日常生活中从不说日本话，也决不替日本人办事；宁可挨饿，也不以“日本侨民”的身份领取物资补助。钟理和离开大陆之时，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在给林海音的信中说，他后来得病与“此几年间的过分用工不无大原因”。^② 回台之后，钟理和凭着扎实的汉文基础，在高雄找到了一份中学教师的工作，但好景不长，命运却好像老是在与他作对，几个月后，他“病倒任所”，为了养病，只好“辞去职务”，挈妇将雏“不得不硬着头皮搬回乡下——老家来”。^③ 钟理和的病不仅未见好转，后来还并发了肠结核。他进入台北松山疗养院接受治疗，一住就是三年，其中“有二年间一直在生死边缘上来去徘徊”，九死一生，才“拾得余命退院回家”。^④ 这段时间钟理和基本停止了创作，但写作却未停下，他用日记的方式记录下在医院的所见所闻和自己挣扎在生死边缘时真实的内心世界。对钟理和后来的创作来说，这是一段准备期和

① 钟怡彦编：《新版钟理和全集·5》，高雄县政府文化局2009年版，第17页。

② 钟怡彦编：《新版钟理和全集·7》，高雄县政府文化局2009年版，第175页。

③ 钟怡彦编：《新版钟理和全集·7》，高雄县政府文化局2009年版，第136页。

④ 钟怡彦编：《新版钟理和全集·7》，高雄县政府文化局2009年版，第136页。

思想升华期。

医院里每天都在上演着生死离别，目睹周边病友的一幕幕悲剧，给他造成了极大刺激，一边是对生的渴望，一边是对死亡的恐惧，在开刀和疼痛面前，他和病友们“更怕病，更怕死，更怕由疾病引起的苦恼”！^①在强烈的求生欲望的支撑下，钟理和积极配合医生治疗，经过两次大的手术，病情基本稳定下来，一位姓林医生劝他“病稍好时，无妨也写写疗病记之类的东西。他以为疗病本身，便是一篇可歌可泣的奋斗史，自己体验了，赤裸裸地写出来，准会是一篇感人甚深的好作品”。^②住院期间，钟理和阅读了大量大陆现当代作家的优秀作品和外国名著，用日记的方式写下了一些心得体会，同时开始着手创作《故乡》系列。住院三年是钟理和思想的飞跃期，如果说大陆八年的漂泊让他积累了丰富的丰富的人生经验，那么，三年医院的生死辗转使他看见了生命本质，比普通人多了一份对生命的敬畏，苦难之后也多了一份坦然和平静。三年来他忍受疾病折磨和亲人分离的痛苦，也因为家庭“萎靡破落”备尝贫困无助的煎熬，他把这些视为“自己的罪恶”，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在他的人生走到低谷的时候，离生命的本相越来越近，他反而感觉轻松和解脱了很多。临手术前他留给妻子一封长信，除了回顾两人一路走来的艰辛和对家庭的愧疚外，钟理和从从容容地交待了自己的后事：“一：吾尸可付火葬，越简单越好。二：多多想你们的事，不必为已死之人伤心……”^③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悲痛欲绝，淡淡的忧伤中透着理智和坚韧。

出院之后的钟理和倍加珍惜生命和时间，自1950年至1960年去世，先后创作了包括一部长篇小说《笠山农场》，一部中篇小说《雨》以及

① 钟怡彦编：《新版钟理和全集·6》，高雄县政府文化局2009年版，第114—115页。

② 钟怡彦编：《新版钟理和全集·6》，高雄县政府文化局2009年版，第121页。

③ 钟怡彦编：《新版钟理和全集·6》，高雄县政府文化局2009年版，第137页。